

康有为文选

【注释本】



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
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
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
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康有为文选

【注释本】

姜义华 张荣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文选/姜义华,张荣华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306-4534-X

I. 康… II. ①姜…②张… III. 康有为(1858~1927)—文集 IV. B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2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00 元

编辑前言

近代中国的历史,写满了耻辱。伴随着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国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大量白银和无数珍贵文物流向海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充满着希望。即使观念最为保守的顽固派,也不再否认这一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欺辱。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众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疗治社会痼疾、摆脱民族危亡、富国强兵、解民倒悬的妙药丹方,掀起了持久的出国留学、越洋考察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局面。长期被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束缚的思想得到解放,进化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制夷”、“共和”、“立宪”等各种思潮,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再造民魂等各种主张竞相纷呈,划破了神州上空阴霾密布、黑暗沉闷的夜幕,重新点燃了民族振

兴的希望之光。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当前,刚刚摆脱沉重的历史羁绊的中华民族,正以空前迅速的步伐,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时代。尽管当前的国内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与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素质、文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也并不比应付当年列强的枪炮来得轻松。落后便要受制于人,更谈不到真正的民族尊严。因此,认真吸取、借鉴前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深入开发、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少走弯路,使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

为此,我们策划并编辑了这套“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本丛书选择中国近代史上曾在各个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某些方面成就卓著的人士,将最能体现其思想、代表其成就的文章、作品编为一集,人各一书。每书的前言,对其思想、主张、历史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客观的评价。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每篇(组)文章均通过题解介绍其背景、主旨、作用和影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克服语言障碍,还对文中的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有关事件、年代、风俗等语词和引文加以尽量详尽、准确的注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同时,更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对本丛书存在的问题给予直率的批评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年10月

前 言

姜义华 张荣华

百年风云激荡，造就了不止一代的民族巨人，康有为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19世纪末，康有为作为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思想家和学者，曾经站在时代前列，在政治、思想、学术等众多领域内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可贵探索。20世纪开始以后，他逐渐成了时代的落伍者；然而，他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

从晚清到民国，自国内至海外，康有为始终笔耕不辍，“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终其一生，留下了千万字以上的著述。据康有为自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部十六种、史部六十五种、子部二十八种、集部十九种，共一百二十八种。这一目录尚不包括康氏生前最后数年的著作和大量函电。其著述之丰、包罗之广，显示了康有为贯通古今、衣披万世的博大抱负。他一生的著述，对于研究他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生平简述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先后号长素、明夷、更生、更姓、重父、天游化人、西樵山人、南海老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这是一个学者、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家庭。康有为自幼便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浸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十九岁那年，他到九江礼山草堂从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接受“专尚践履，兼讲世事”的实学，并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产生浓厚兴趣。在思考的触角和视野大为扩展的同时，他对传统文化本身能否经世致用萌生了怀疑，时常为求道无着而深深苦恼。即使在1879年春只身一人在西樵山白云洞潜心专研佛道，也仍未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居西樵山期间，他与前来游山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结识。在张鼎华的启发下，康有为舍弃帖括、考据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把更多精力用于阅读各种治国、经世的著作；同时览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社会及西学的著作。1879年底，他初游香港，目睹瑰丽的宫室、整洁的道路及良好的治安，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开始突破“华夷之分”的传统观念，把求道的希望移向西学。两年以后路过上海，遂大购西书，探究西方国家进步原因。

1888年底，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出现的民族危机，以布衣身份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这次上书因“大臣阻格，不

为上达”（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以后的几年中，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并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获悉后，于5月2日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次日会试榜发，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不就。5月29日上清帝第三书，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受到光绪帝赞许。8月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周刊（后改名《中外纪闻》），并与文廷式、陈炽等人筹设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次年强学会被封后，康有为回到万木草堂继续讲学，并撰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他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陈“四邻交逼，不能立国”，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臣而谋变法，听任疆吏各自变法。次年1月，光绪帝命王大臣延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并命康有为条陈所见。于是康有为连续上书，又组织京师保国会进行宣传鼓动，敦促光绪帝痛下决心，正式宣布变法为国家根本方针。在康有为及其同伴的努力下，光绪帝于6月11日“诏定国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旋又离港赴日。他坚持改良主张，幻想日本和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于1899年7月组织了保皇会。此后数年间，他奔波于日

本、加拿大、香港、英国之间，在政要及华侨中展开保皇与救上的宣传活动，同时写下了《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庸注》、《孟子微》、《礼运注》、《大学注》、《论语注》、《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资产阶级革命日渐兴起的形势下，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等长篇论文，论证革命不适于中国国情，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清政府在1906年9月发布预备仿行立宪上谕后，自称“大喜欲狂”的康有为又积极配合揄扬，并把号称会员数十万、遍布海外一百七十餘埠的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改名“中华帝国宪政会”），忙不迭地准备做一个举国大政俱归执掌的执政党。

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到1913年12月返回广东故乡，在将近十六年的时间内，康有为曾三次环游地球，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足迹。其游览之广、旅程之长，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请人所刻印章上的这段文字，便简洁地概括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正如康有为本人所言，他周游世界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考求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自觉担负着寻求救国药方的重任。他自喻遍尝百草的神农，四游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七游法国，八入英国，十一次至德国，对欧美先进文明“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梠，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从他在游历期间写下的《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等著述，以及近百万字的游记中可知，康有为所开列的“神方大药”，其根本性质在于要求迅速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便攫取了胜利果实。康有为目睹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生艰难、教化陵夷的混乱现状，感到无法忍受，遂于1913年2月创办了《不忍》杂志。他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袁世凯政权的腐朽本质和卖国倾向，对军阀割据混战给社会和民众造成的灾难进行深刻的揭露；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文章中对篡夺了正式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政府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并向其进言，撰写了《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国还魂论》、《乱后罪言》等文，认为是“欧美人之自由自治平等革命共和民主之说”造成了今日之大乱，要保全中国，必须先保存和导扬国魂，所谓国魂，则集中体现在孔教之中。因而他授意门人陈焕章等人，于1913年底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康有为奔走呼号，提倡定孔教为国教，鼓吹尊孔读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逆流。

1917年，张勋北上拥戴清废帝复辟。康有为积极出谋划策，并亲赴北京助阵。这次不得人心的复辟很快就被粉碎，但康有为并未由此而醒悟悔改，而是继续坚持复辟清王朝的决心。他将戊戌以来反对民主共和、宣传君主立宪的政论汇编成《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出版，自称四十年来的言论都没有过错，确信只有他的主张才能挽救中国。

在康有为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除了漫游全国各地，随处发表政论演说外，还于1918年在江苏金坛县创办了“述农公司”，在经营资本主义农场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1926年，他还在上海开办了一所天游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授《诸天讲》等书。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福山路寓所，享年七

十岁。

二 启蒙思想

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康有为在近代第一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上，而对其早期思想状况语焉不详，少有论列，由此便影响了对康有为启蒙贡献及其一生思想演变的准确评价。

事实上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康有为已试图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命运与前途作全面的思索。他在那时写下的《民功篇》、《教学通议》、《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论著，清楚地表明他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渐深重的现实刺激下，如何急切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寻求破块发蒙的思想武器，如何从一个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革家，并逐步构造起他的思想体系。

这一时期康有为思想的启蒙性质，首先表现为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明朗阐扬。如同欧洲的启蒙学者大多从确立人的趋吉避凶、趋乐避苦的本性特点来肯定和提倡人的解放，康有为在《民功篇》这部未完成书稿中明确表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快乐，争取今生的乐趣与利益，正是“治世所以异于太古、中国所以异于夷狄”的根本所在。他认为：“人道求美，人道求乐。官室舟车、衣服文字、历数伎乐、什器礼治，皆以乐民。”把人生目的归结为寻求“美”与“乐”，把一切生活设施、社会制度统统还原为人们追求幸福和利益的手段，这是对人生目的的重新规范。

在康有为看来，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之所以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关键在于他们“有功于民”，即实际造福于民。“上世贵智齐类，熙熙无所雄卑，能制作则民推戴之。”只有那些为民众建立功业的人，才有资格称做民之主。这些论述实际所要强调的是，为民造福是国家活动的惟一目标，君主只是满足人民利益、保证人民幸福的工具，其荣辱存亡都是以“民功”大小为转移。由此，康有为对秦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生的抑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强调，华夏文明从秦代以后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大发展，社会人生之所以日趋恶化，原因就在于功利原则已趋衰绝，失去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活力。“从秦既笃既久，以为时制之宜，只知君国为重乃大，以民为轻，于是二千年来，民功遂歇绝息于天下。”

从人道主义立场发出“人的解放”的初次呐喊，是康有为启蒙思想的又一表现。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首先系统地提出了近代意义上“自然的人”的观点。他针对理学家把自然和人说成是散发神学气息的“理”的产物，指出“分天地原质以为人”，明确规定了人的自然属性，要求从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人本身寻找“人”的本质，从人的自然本质去了解人性的产生，而不应从虚无缥缈的精神领域去寻找。他通过对中国古代各种人性学说的清理，否定了性情分途说和理欲对立论，说明人的自然存在是人具有各种特殊属性的基本前提。他形象地把人性比做“丝帛”，把善、恶等属性比做经过加工了的丝制品，说明人性在初始犹如一块白板，只有当人受到外界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从事社会交往与活动，方才逐渐染上善、恶、诈等各种属性。

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康有为进而提出了人的天赋权力

说。按照人“各具一魂”的原则，康有为认为人人生来便享有自由，“人有自主之权”是人生最基本的权利，维护自由的权利，便是维护做人的资格。人的另一条基本权利，在于“兴爱去恶”、“重赏信罚诈”，贯穿其中的则是博爱原则。由于“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不在互相逆制之内”，这种相互制约，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相互平等的交往，平等也便成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康有为强调，构成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任何违背这些准则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人有“差等”性、“不尽有兴爱去恶”等等，都与人道相违背，都不合几何公理，必须彻底去除。

这样，康有为便把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引入到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探讨，使“人的解放”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它表明，人的本质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力真正获得，决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有深刻内容的社会问题。马克思说过：“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0—461页）康有为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轨迹，把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从人的自然性质继续深入到人的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通过对男女夫妇关系、家庭父子长幼关系、君臣关系、师徒关系的分析，对封建社会关系中不平等、受屈辱的现象，做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揭露批判，并在人道主义旗帜下，提出了新制度下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原则，提出了未来社会合乎人道天理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

的设想。他把人作为社会的人看待，使得他所做出的批判和创新具有深刻的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此外，康有为还注意把人当作政治的人看待，以无畏的精神，对封建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礼、刑、教、治的政治制度及观念形态逐一展开批判，并进而确立了相应的、符合公理的政治制度。

通过对古典范畴的新诠释，试图构造一个以“智”为核心的观念体系，并要求全面改革现存教育制度及其内容，改变中世纪“士”以社会伦理为主的单一知识结构，使之由“卫道型”转向合乎时代发展的“知识型”人才，这一点也构成了康有为启蒙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康子内外篇》一书中，康有为强调了知识、智慧、文明在人之所以为人中的突出作用。“物皆有仁、义、礼，非独人也。鸟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即牛马之大，未尝噬人，亦仁也；鹿之相呼，蚁之行列，礼也；犬之卫主，义也。惟无智，故安于禽兽耳；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皆智生也。”人凭藉其独有的智慧、知识及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从事社会活动与劳动创造，解决吃喝住穿，以维持生存，繁衍种类，然后才创造政教伦常、道德观念。智不仅是人类摆脱动物状态的根本标志，而且是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合万亿人之脑而智日生，合亿万世之人之脑而智益生，于是理出焉。”

康有为认为：“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无智则无爱恶矣。故谓智与爱恶为一物也，存于内者，智也；发于外者，爱恶也。”智作为人的特有属性，不仅使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而且还规定着人的其他属性以及各种“人理”即伦理道德。“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

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智先理后，仁、义、礼、信是由人智所制定的人理，因此，智与人理具有主从关系，智统率仁、义、礼、信。

在论证了人类社会中智的决定性、能动性作用后，康有为以智、礼、义三者作为不同时代的核心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做出基本估计：“上古之时，智为重；三代之世，礼为重；秦汉至今，义为重。”他强调指出：“秦汉以后，既不独智以为养，又不范礼以为教，时君世主，以政刑为治，均自尊大，以便其私。天下学士大夫相与树立一义其上者，砥节行，讲义理，以虚言扶名义而已，民生之用益寡矣。”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从一私一己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扼杀人智，毁坏教育。同时，等级制观念、尊卑观念也日益深深地渗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极大地压抑了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并使读书人自小便求贵寻富，一生进行以入仕为目标的角逐，将年华耗尽于科举场上、八股文中。

由此，康有为在《教学通议》一书中，通过对古代教育的历史反省，发出了教育近代化变革的呼吁。他指出，教育要确立“通变宜民”的方向，即通过变革，使教育真正成为全民之学，起到开民智、佐国政、正人心的作用。为此，先要改变阻碍教育普及和发展的语言混乱现象，使全国民众所使用的语言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无碍。在对现行教育内容的改造方面，除了改革心性义理之学、加强德行之教这一重要方面外，他着重强调要革除学而无用的文章词赋之学，加强经世致用的“六艺”之教。

为此，康有为分别提出了“六艺”（即礼、射、御、乐、书、数）之教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具体内容。比如“礼”教在于考

今古礼之异同，使两千多年纷如乱丝的礼仪制度得到治理，使人人皆得以知古从今。“射”则必须将近代兵器学列入，使人人共学之，寓武事于承平。“御”则应当从六艺中剔除，而代之以图画，使图画成为必学之课。《教学通议》中有关乐、书、数的内容已佚失，但从康有为不久后开办长兴学舍，将《教学通议》的思索付诸实施来看，所谓“乐”，重点在于近代美育教育，“书”的内容包括“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书”，“数”的内容包括学习和掌握近代数学等科学知识。

康有为关于新教育内容的设想，虽然在表述上仍使用了传统说法，但已开始注意改变中世纪“士”以社会伦理为主的单一知识结构，以及以经书、辞章为本的狭隘知识容量，而要求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并学，古今中外并讲。“吾《长兴学记》功课部有七条：一养心，二修身，三执身，四接人，五时事，六夷务，七读书。”（《桂学答问》）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学生在开阔视野、突破时空和国界、扩大知识量的基础上，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从以往的“卫道型”转向“知识型”，从中世纪的“士”变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

上述这一切表明，在19世纪八十年代时，康有为已经成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杰出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成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山鼻祖。尽管在九十年代以后康有为将自己的理论学说裹上了一层儒学外衣，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核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三 变法巨子

作为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戊戌变

法与康有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长期奔走呼吁、倡导变法的结果，也是康有为一生政治实践的高潮。众多事实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这一极不寻常的一刻，为了造就一场气势恢宏的变革实践，康有为自觉地充当了旗手和主将的角色。在短暂的数月内，他四处联络，握管疾书，诣阙上言，外鉴欧美、日本的变法经验，内采古代传统学说中的思想言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众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宏大的变革设想。

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维新派缺乏实权及其他原因而告失败，使得康有为和其他仁人志士为之抱恨终身；但它以其不可磨灭的业绩，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显示出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中公认的一点，就是戊戌变法在本质上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而这一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变法领导人的康有为所做出的建树联系在一起。

概括而言，康有为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首先是促使人们从传统儒家经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有为又撰写了《孔子改制考》。他在书中试图推翻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刘歆（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之子）为了变乱孔子之道而编造的谎言。他从多方面考证孔子托古改制，认为孔子是制法的素王、改制的教主，为了改革周朝的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治理国家的方案撰成《六经》，假托古人言行，“一切制度，托之三代之先王以行之”，“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他在书中专设一卷“《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强调《春秋》是孔子为改制而亲手撰写的，《六经》也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言论，其目的不仅是为康有为立变